

# 先达和棉兰的文教报业的锻炼

##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(一)2

华侨抗日地下组织的成员,他们的一言一行,对我们这些学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记得上学期间,我曾两次听过王任叔的讲演。一次在中华学校礼堂,另一次在日里电影院。他那浓重的江浙口音和美髯公形象至今历历在目。

先达华侨中学成立后,原有的初中三个年级,即民主级、海燕级和火花级由于生源不够,合并为华青级。把民主级往下拉一级,火花级往上提一级,这一来,火花级同学,特别是我,数理化功课显得很吃紧。记得初中毕业时,我的数理化也将及格。我把精力集中在文史地。

当时,我利用空暇时间,撰写一些小文章,投给棉兰《民主日报》和《苏门答腊民报》。第一篇文章被录用时,着实让我兴奋不已。从此形成良性循环,文章发表越多,写作动力越强。

后来,我参加过一次苏北华文作文竞赛。我写了一篇游记,荣获第三名,获赠一本苏联托尔斯泰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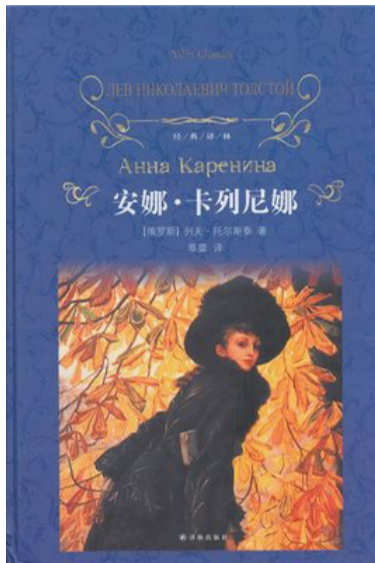
邮递员投递这本书时,我正在屋内饭桌上,伏案刻蜡板。听到门前一个包裹落地声音,马上打开包裹,里面除了上述那本书外,还有一封短信和刊载获奖文章的文艺杂志。我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获了奖。这个包裹确实给我带来极大惊喜为此亢奋了好一阵子。

1949年10月1日下午五六点,我正在韩江同乡会篮球场打球。王羨琦匆匆把我叫出场,兴奋地告诉我,北京已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。

这个消息是他爷爷王定一告诉他的,非常可靠。

当时我是华青级壁报负责人。听了这一消息,兴奋不已。马上找其他编委黄光辉、林瑞玲、邓新荷、陈素琪等商量,如何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迅速反映出来。

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



动。“从此中国人可以扬眉吐气了”“我们再也不是海外孤儿啦”……这些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的话语,不绝于耳。

经讨论决定:明天一早在壁报上书写热烈庆贺新中国成立的大标语,然后组织稿件出版一期特刊,以示庆贺。

在以后数天里,先达华侨都沉浸在热烈庆贺的氛围中。街道张灯结彩。由我和佩霞打头的学校秧歌队也跳到大街上去了。

这历史性场面仿佛昨天刚发生。那种激动、亢奋永远挥之不去。

华青级是先达华侨中学创建以来首届初中毕业班。1950年12月17日,《民主日报》特拨出整版,发表由我们编撰的毕业特刊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鞭策。

我为特刊写了一篇刊首语《在风雨中成长的华侨学校》,今天重读63年前写的这篇文章,虽然觉得其中有些遣辞措意,略显稚嫩和激烈,但总的政治倾向是正确的。

这种政治倾向在我人生道路上一以贯之。

由于师资缺乏,学校无法开办正规的高中班。几经研究,学校为我们开办了一期别开生面的高中补习班。

半年的补习班使我们受益匪浅。

补习班只开设语文、政治经济学(含哲学)、印尼语文和历史、英语四门课,而且一改以往的“我教你受”的应试教育方法,实行开放式、

座谈式、辅导式的教育方法。老师起引导和辅导作用,不给学生打分数。

这样一来,学生的思路更加开阔,更加活跃。

语文课:大家就一篇文章展开讨论。从文章的遣辞立意到内容特点,各抒己见,不做结论;英语和印尼文课:大家听完课文后,轮流上台,用英语或印尼语重述课文内容,也可以即兴发挥,以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和掌握外语的水平。

上政治经济学(含哲学)和印尼历史课,这种辅导启发、座谈讨论的方式,其效果更为显著。

此外,我们还不定期出版中文印尼文双语壁报。结业时,我们出版了一本小开本、蜡纸刻印,内容是16名同学和5名辅导老师的临别赠言。60多年后的今天,重读这本弥足珍贵的《华青纪念册》,还是情绪激动,热泪盈眶,久久不能平静。

16名同学:王佩霞、王羨琦、邓新荷、李月萍、李隆达、林瑞玲、林联联、林锦寿、陈素琪、蔡素珍、蔡达荣、黄梅英、黄妙珠、黄光辉、黄炳崇、黄书海(8男8女);5位辅导老师:郑子经、陈宏伟、陈清泉、伍焕沾和K.西当岸(印尼人)。

华青级把最圆满的句号划在马达山毕业旅游。全体师生,心情轻松愉快,或爬山、或骑马、或品尝当地美食,或迎着徐徐凉风,在朝晚霞陪伴下,脚踩绿茵茵柔软的草地,谈心说笑,畅抒胸臆。这种氛围在校园里是不可能享受到的。

返程路上,旅游车厢里依旧充满欢声笑语和欢乐的歌声。而当旅游车开进韩江同乡会篮球场,师生们下车握手话别时,彼此才依依不舍,歉款而别。

### 教书生涯

1951年7月,华青级结业后,同学们各奔前程。有的到棉兰华侨中学继续深造,有的

回国念书,更多的是走入社会,或从商或当老师。

我和林友联被安排到先达市郊璜汶镇的璜汶小学教书。我任校长兼教课。

学生近百人。绝大部分是当地和附近剑麻园的华侨子弟。几十个学生,按成绩分成四五个年级,加上教室不够,不可能按单式编制施教,只能采取复式编制,即把不同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进行课堂教学。

工作量之大,教学之难,对于刚走出校门,缺乏教学经验的我们,确实是严重的挑战。好在当时我们很年轻,不缺工作热情和干劲。更好在有璜汶华侨总会主席张开荣(伟斌父亲)和理事林廷省(春强父亲)的大力支持,充当我们的坚强后盾。

我们住在学校,轮流到张家和林家搭伙,减轻了繁重的生活负担。他们都是潮州人,与我同乡,有许多共同语言。

他们知书达理。除了给我们提供物资上的支持外,从不干预教学事务。让我们放手干,大胆干。

由于生源大量增加,第二学期增聘陈玉霞老师加盟。我们合作得很融洽。

我们都是年轻人,力图以身作则,以德服人,努力做一个深受学生喜爱、教书育人的新型老师。正如宋朝范仲淹所云:“以德服人,天下欣戴,以力服人,天下怨望。”

我们亲自打扫庭院和教室,挑洗澡水,赢得当地华侨和学生的敬重。

张伟杰和伟斌,是张开荣的儿子。当年十几岁,是 high 班学生,很愿意和老师交谈,反映同学们的要求和意见。这对我们作出有的放矢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。

从学生中来,到学生中去。我后来决定,每周一上大课时,宣讲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等长篇小说,很受学生们欢迎,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
几十年后,伟杰、伟斌

来北京旅游,还念念不忘上大课听故事的事,让我感到很欣慰。

我们还拓展了当地学生和先达学生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。我们曾带领学生到先达影院看电影《白毛女》。先达华侨学校少先队也曾到璜汶来远足。取长补短,相得益彰。

教美术时,我曾用毛笔画过一张胡志明头相,并悬挂墙上。我知道我的小学弟林妮辉擅长画画。他到璜汶来玩时,便请他在教室当场作画,让学生观摩学习。妮辉欣然在准备好的画纸上,用黑画笔,简明了当地勾画出列宁头相,博得大家啧啧称羡。这美妙的一幕永远刻印在我脑海里。

璜汶是路边小镇,商铺沿马路而建。华侨华人充其量不过一两百人。镇虽小,却五脏俱全。璜汶华侨总会除了承办红白喜事外,主要任务就是办好当地的华文学校。

我们在璜汶教了一年书,工作和学习两不误,相辅相成。那里留下了我们最初踏入社会的青春足迹和汗水。

在璜汶教学一年,除了做好校务和教学外,我把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攻读印尼文和写作上。

1952年7月至12月,我回到先达华侨中学母校,教了半年书。感触颇为新鲜。

过去上课的教室变成了教学生的教室;过去教我的老师变成了同事;过去比你低班的同学和你称兄道弟,打打闹闹,现在他们改口称呼你老师,站在你面前“肃然起敬”的样子,会让你很不自在。但这一切,随着教学工作的开展,很快就适应了。

学校安排我教初一、初二班的印尼文课,并兼任几节文史课。我和张育文老师还担任华侨学校少先队辅导员。其时正在兴建巴尼街华侨中学校舍,我们经常带领学生到工地义务劳动,工作十分繁忙,但心情十分愉快。

在批改学生作业时,我